超越传统、现代与后现代： 涌现性符号翻译理论

宋美华 西南交通大学 / 利兹大学

摘要：复杂性于近年来受到中外翻译学界的关注。相关探索，以南非学者科布斯·马雷的涌现性符号翻译理论最为突出。该理论是对翻译研究宏观发展趋势中根本问题的回应，以复杂性哲学为认识论出发点，结合复杂性理论中的相关概念，在皮尔斯符号学中翻译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可解释带有“翻译性”现象（包括语际翻译）的翻译定义，超越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翻译研究在哲学意义观上的对立，在认识论、方法论、学科互涉方面有重要意义，可谓目前翻译理论的前沿研究之一。

关键词：复杂性；涌现；符号翻译；约束；吸引子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3X (2023) 01 - 0033 - 11

复杂性是当代科学的前沿，已在世界近代自然科学领域发展了百余年，尤其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其在物理、化学、生物科学等领域愈加突出，并于90年代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①。复杂性研究或复杂性科学已发展为一门多个学科互涉的领域，不同学科领域的复杂性研究者通常基于本学科来给复杂性下定义，因此，很难对其进行一成不变的定义，也很难对其历史发展进行穷尽式梳理（Mitchell, 2009: 94-95）。一般认为，复杂性理论并非指形式上的复杂，亦非单一连贯的理论体系，而是发展自不同学科领域，涉及不同传统和方法，“把实在（reality）作为复杂性现象来对之进行理解”（Marais, 2014: 19）^②。复杂性理论的重要性不体现在学科互涉上，还体现在其以非线性、整体性、关系性和过程性思维为特征的探索模式以及对复杂性现象所持的认知态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是对西方自笛卡尔以来科学研究上还原论的补充和“革命性突破”（Marais

& Meylaerts, 2019: 1-3），是人类认识和探索世界的一种进步。复杂性近年来受到中外翻译学界的关注。

中国学界2010年代初将复杂性引入翻译研究，相关学者的主要贡献在于对复杂性理论一些概念的引介及其对中国译学研究启示的探讨。杜玉生、何三宁（2010）是较早用复杂性思维来审视中国翻译研究范式的学者，主张中国译学研究应该超越传统研究的还原论和狭隘的学科边界意识。关于复杂性在翻译研究中的具体效用，以吕俊的研究最为突出，他倡导从复杂性思维的认识论出发对我国翻译研究进行范式改革和学科革命，倡导在复杂性认识论的框架下展开对中国译学研究相关话题（如翻译标准）的讨论（吕俊，2013；吕俊、侯向群，2015）。总体而言，相关探索有三点遗憾：第一，未引起中国译学界更多学者的相关重视和讨论；第二，未形成复杂性翻译研究范式的相关理论或概念；第三，未能与国际翻译研究宏观发展现状和

问题相结合。

国外学界也是近十年开始复杂性理论启发下的翻译研究，论研究成果及影响，当以南非自由州大学翻译研究学者科布斯·马雷（Kobus Marais）的研究为最。他目前已发表两部英文专著（2014/2019b）、三本主编论文集（Marais & Feinauer, 2017; Marais & Meylaerts, 2019; Marais & Meylaerts, 2022）和一些重要学术论文（2011/2013/2018/2019a/2019c/2020）。这里首先基于国际翻译研究发展的宏观趋势讨论复杂性之于翻译研究的必要性和马雷的涌现性符号翻译理论提出的背景，随后从基本假设、翻译定义和理论意义三方面探讨涌现性符号翻译理论，解读该理论的思想机制与核心概念，分析其在认识论、方法论、学科互涉等方面的启示。

一、涌现性符号翻译理论提出的背景

（一）翻译研究的宏观发展趋势与问题

马雷的涌现性符号翻译理论提出的背景与国际翻译研究的宏观发展趋势相呼应。目前，翻译研究的宏观发展至少存在三个主要问题：1）传统、现代与后现代在哲学意义观上的对立；2）理想主义倾向；3）两个“悖论”。其中，翻译研究传统、现代与后现代哲学意义观上的对立关乎在认知层面和操作层面对翻译本质的认识，关乎翻译研究在理论上对翻译的定义，是翻译研究总体发展不得回应的根本问题。

1) 传统、现代与后现代翻译研究在哲学意义观上的对立

传统的翻译研究持规定性、前瞻式、以指导实践为主的翻译观，其哲学意义观在很大程度上与起源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先

验本质主义论相吻合，总体上是一种本质主义意义观（宋美华，2018/2019）。与传统翻译观不同，现代和后现代都承认绝对客观性或绝对客观的知识是不可能的，但现代实证主义翻译研究“坚持假设检验”以对现象或实践进行“普遍性概括”，而后现代则更受伦理启发，采用“一种怀疑和相对主义的立场”（Delabastita, 2003; Chesterman, 2019: 11）。这种矛盾和对立从根本上讲是哲学意义观的对立。现代翻译研究的哲学意义观总体上是基于索绪尔等的结构主义意义观，从认识论上承认意义的稳定性，而后现代的意义观主要是基于后结构主义哲学和德里达的解构意义观发展起来的，对意义的稳定性持否定态度。虽然后现代翻译研究里的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学派出于各自所坚持的政治日程，难免与初始没有稳定意义来源的假设相矛盾，但从哲学意义观或认识论的角度讲，后现代否认意义有稳定的来源，否认意义的稳定性。现代与后现代哲学意义观的对立，一方面促使翻译研究对此作出回应，促进现代和后现代翻译研究不断地调整和纠正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又说明，这种哲学意义观的对立是翻译认知层面的对立，是无法调和的。

2) 翻译研究宏观上的理想主义倾向

现代和后现代翻译研究都意识到意义的复杂性，但各存在着自身的发展问题。现代已经摒弃传统翻译研究的形而上本质主义意义观，尤其在发现本质意义的方式上，“带有反本质主义的特点”，体现出现代阐释意义观和建构主义意义观，后现代“并非都否认意义的终极再诠释”，二者在意义的建构论方面有相通之处（宋美华，2019: 12）。然而，现代不可能放弃实证主义的描写，后现

代不可能放弃所坚守的政治日程，二者某种程度上都处于一个悖论的境地。无论是“追求纯粹客观和普遍性的描写研究”还是“追求纯粹的后资本主义、后父系、真正后殖民主义社会的后现代研究”，二者“都是不可能的，某种程度上都带有一定的乌托邦性质”（Delabastita, 2003: 19-21）。同时，相对于现代翻译研究，后现代翻译研究占据伦理制高点，“呈现以伦理驱动为主的理想主义”，这也是蔓延于整个人文学科发展的特点（同上）。

3) 翻译研究发展的两个“悖论”

翻译研究的发展一直存在着两个主要“悖论”。其一是翻译研究自身的扩界与守界。翻译研究一面为了学科发展需要不断拓展翻译定义和学科边界，一面又为了学科地位不得不竭力保持学科的边界和独立性。尤其近二十年，随着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涌现出很多新的翻译现象，挑战已有翻译概念，引发对翻译（研究）边界的思考（Dam, Brøgger & Zethsen, 2019）。其二是翻译研究对翻译概念的更新与外界（相邻学界和业界）对翻译概念的固有认知。现代或后现代翻译研究主张对翻译的多元理解，但翻译概念多与语言和译文（常被称为“翻译”）密切相关，大部分外界一直把翻译研究里的“翻译”理解成操作层面的语言转换（Gambier & Van Doorslaer, 2016）。为此，有学者（Van Doorslaer, 2019）提议对翻译研究（TS）学科重新命名（trans-studies）以包罗其不断扩展的边界，有学者（Bassnett & Johnston, 2019）倡导翻译研究的“外转向”（outward turn）以实现其与相邻学科的互涉。

以上关于翻译研究宏观发展趋势中问题的探讨某种程度上表明，翻译研究学科在范

式上的革新可能需要至少在两个层面触碰翻译定义的问题：其一为认知层面，这就需要超越现代和后现代哲学意义观的认识论；其二为解决“一”和“多”的悖论，以使翻译研究学科整体的普遍性与学科内的各种特殊性相融合，以及从翻译学科视角为其它学科带去洞见的可能性。这两点表明翻译研究有必要从复杂性视角进行翻译定义或翻译理论的建设。

（二）涌现性符号翻译理论的提出

马雷涌现性符号翻译理论的提出正是对以上翻译研究根本问题的回应。

首先，他认为翻译研究里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争论说明二者都有问题，需要补充以“复杂性认识论”（Marais, 2014: 15）。西方科学研究上的简单论或还原论，尤其源自笛卡尔的物质和思想的二元对立哲学观，在自然科学领域忽略了思想的存在，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忽略了物质的存在。复杂性哲学超越了这种二元对立的极性，既非唯心主义、亦非唯物主义哲学，而是一个产自悖论的哲学。该哲学提出一种“元元叙事”（meta-meta-narrative），以处理各种复杂（自相矛盾）的元叙事，主张所有典型的二元对立或矛盾的概念（如部分和整体、普遍和特殊），理论上都是构成实在的部分（同上：21-22）。法国著名复杂性思想家莫兰把复杂性哲学称为“元哲学”（Morin, 1990[2008]: 48），马雷（2014: 46-74）据此把复杂性哲学看作“元认识论”，将其作为“元学科话语”，用超越二元对立的视角透视翻译研究里各种逻辑上相悖的存在，以使翻译研究在学科层面与更高的哲学视景结合起来。

其次，针对翻译研究里的理想主义倾向，马雷批评翻译研究者“经常出于实用目的把

翻译研究当工具，做着只是材料不同的重复研究，得出重复结论”；此外，他更直接指出，很多以第三世界为背景的带有后现代主义倾向的翻译研究，是以西方的自由伦理为基础的，忽略了第三世界国家自身所处的环境和事实，翻译研究“需要一点儿现实主义，兼顾普遍性和特殊性”（Marais, 2014: 4-5; 2019b: 33-40）。概言之，马雷强调翻译研究不该只聚焦翻译实践相关的实证主义或极端相对主义研究，而应超越各种“转向”和二元对立来探究意义或翻译的本质。

再次，马雷回顾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翻译研究七十余年的发展，指出以欧美为中心的翻译研究长期以来偏向于语言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即使是符号学领域中一些符际翻译研究亦受到语际翻译理论的束缚，只是“从符号学角度对语际翻译定义的补充”（Marais, 2019b: 26）。然而，随着全球化和科技的发展，新型的翻译现象和实践以及随之而来的新型翻译概念层出不穷，愈加表明翻译不但涉及语言符号，还涉及非语言符号。此外，一些生物符号学领域的学者（如：Jacob von Uexküll, Thomas Seboek）关于翻译概念的讨论表明，意义产生和意义接收“不仅限于人类而是所有生物之间的交流”（Marais & Kull, 2016; Marais, 2019b: 100-118）。马雷（2019b: 2-5）认为，翻译领域内很多以“交互”（inter-）或“跨”（trans-）为前缀的新型概念（如：intermodality, transmediation）与生物符号学的翻译概念都表达具有交互性或“翻译性”（translationality）本质的“过程-现象”（process-phenomenon），兼含“过程和形式”，而非“具体的事物或单一的过程”。“过程-现象”这一术语与下文提到的过程本体论

一致，术语中的连字符表达马雷的一种信念，即翻译不是“具体的区别于其它事物的事物”，而是“采取形式的过程”（同上：83）。

马雷以上观点表明，翻译研究在认识论层面，应该佐以复杂性哲学认识论，超越翻译研究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对立；在概念层面，对翻译的定义应该参照其它学科的洞见，比如（生物）符号学，以事物的“翻译性”而非被称为“翻译/译文”的具体事物为出发点来定义翻译；在学科层面，可将翻译学科作为一个视角来研究其它领域里的现象，实现真正的学科互涉。因此，马雷认为有必要提出一个统一的翻译理论，以解释所有生物符号意义产生和意义接收的过程，即本质上带有翻译性的“过程-现象”，包括语际间的翻译现象。

二、涌现性符号翻译理论的基本假设

基于以上学术背景，马雷的涌现性符号翻译理论的基本假设主要包括复杂性理论和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符号学理论的翻译概念。复杂性理论具体涉及复杂性认识论、复杂性适应系统、涌现理论，以及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过程本体论、热力学第二定律等。需要指出的是，马雷把复杂性理论看作是一级假设，皮尔斯符号学的翻译概念为二级假设，即后者是在复杂性理论框架下解读的结果，目的是在复杂性系统里探讨翻译的本质。

（一）翻译是复杂性系统间的关系性现象

复杂性理论超越还原论的哲学主张及其非线性、整体性、过程性和关系性的思维特征体现在很多概念里，其中复杂性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s）和涌现

(emergence) 是两个被广为讨论和运用的概念。复杂性适应系统概念主要发展自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崛起的圣菲学院 (Santa Fe Institute), 复杂性研究的第一个品牌机构 (Waldrop, 1992)。“复杂性”旨在突出系统组成部分, 施为者 (agent) 或行动者 (actor), 与系统之间复杂、矛盾、无法溶解的关系, 部分构建作为整体的系统, 同时也被系统建构;“适应”表明系统与其环境 (其它系统) 是相关联的 (Marais, 2014: 27)。马雷并非机械地搬用圣菲学院的复杂性适应系统概念, 或直接用复杂性系统代替这一术语, 而是把该概念与不同复杂性领域的系统概念相结合总结了复杂性系统的主要特点, 如: 历史性、自组织性、耗散性、层控性和涌现性等。

复杂性思维认为系统的发展遵循热力学第二定律, 系统元素在交互作用下自发地重新排列系统内部结构的同时也将能量耗散至环境中, 与环境交换能量, 通过与其环境或其它系统相互作用而存活, 表现出系统的自组织性、耗散性和开放性的特点。同时, 历史是一个重要因素, 因为“从逻辑上讲, 时间在这些系统中是单向流动的” (同上: 39)。

复杂性适应系统的层控性与系统的另一核心概念“涌现”相关联。涌现论自 19 世纪末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不断应用和发展, 主张“基于过程和关系而非本质和实体的思维”, 是复杂性视角下探讨整体和部分之间关系的一种方式 (Sawyer, 2005: 10)。复杂性研究界通常认为世界由复杂性适应系统组成, 某一层级的本体涌现于更基础的层级, 是不可归约的, 其中最基础的层级是物理, 往上依次为化学、生物、心理和社会。每一层级的实在由下阶层级各部分之间特定的交互关系形成, 而不是系统外的物质, 但同时

矛盾的是, 本层级确有超出下阶层级的实在 (Marais, 2014: 28-29), 但这个超出不是增加的或系统外的物质, 而是系统内部“涌现”的 (同上: 71)。这种涌现论展现出既非一元论亦非二元论的实在观, 各层级的实在相互关联且都是从物理层级中涌现, 社会实在可概念化为由不同层级的本体构成的层级结构, 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人可以构建一切的理想主义建构论。理论上的不同层级可以是不同的带有各自亚系统的系统, 也可以同时为同一个系统的不同要素, 层级可无限延续下去。

同时, 为克服复杂性适应系统概念有关涌现过程因果关系的机械性, 马雷 (2019b: 160-163; 2019c: 48) 借鉴美国著名神经人类学家特伦斯·威廉·迪肯 (Terrence William Deacon) 的相关研究, 认为涌现过程因果关系的确定是双向和复杂的。双向是指涌现过程涉及向上和向下的因果关系, 也就是部分到整体, 整体到部分; 复杂的, 是指复杂性思维里非线性的意义, 即整体和部分之间无法溶解的关系, 整体涌现于部分交互的结果, 同时又约束着部分并使之可能。马雷所依托的复杂性视阈下的“涌现”概念, 既表示实在涌现的层控性, 也涵盖系统里整体和部分之间无法溶解的交互关系。

根据复杂性的层控实在观, 马雷首先把“翻译”概念化为从物理 - 化学 - 生物 - 心理下阶 (如语言、文化、文学) 中涌现出来, 并在各种社会实在上阶 (如经济、法律、医学等) 的涌现中发挥作用 (Marais, 2014: 29)。他受布鲁诺·拉图尔 (Bruno Latour) 等关于社会建构理念以及约翰·赛尔 (John Searle) 语言哲学观的启发, 认为符号是介于心理和社会之间的一个层级, 社会实在通过符号下阶层级的“符号过程” (semiosis) 而

涌现，而翻译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同上：69-72）。根据这种实在观或本体论，马雷首先将翻译视为“系统间关系性的现象”（a phenomenon of inter-systemic relationality），认为翻译在系统之间进行调解，并将某些变化反馈给系统（同上：96）。也就是，翻译存在于符号过程并在系统之间建立关系，从而约束着系统之间的关系性。为进一步在复杂性系统中定义翻译的本质，马雷需要一个综合的符号翻译概念，该概念不但涵盖人类及人类以外的所有生物体，而且能够体现翻译存在于以及如何存在于无所不在的符号过程。

（二）翻译是复杂性的、涌现性的符号过程

对马雷而言，皮尔斯符号学为复杂性翻译理论探索提供了综合符号学。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皮尔斯没有将翻译限于语言符号系统，因而从理据上使得马雷之后的翻译定义可潜在地适用于所有生物符号系统。第二，在皮尔斯的思想中，意义的产生具有关系性和过程性，而调节和创立关系的过程由翻译来发挥作用。

皮尔斯的符号学主张再现体（Representation）通过阐释项（Interpretant）代表对象（Object），一个事物只有处于这样的符号三元关系中才被视为“符号”（sign）（CP 1.541, 2.228; Marais, 2019b: 89-90）。概言之，皮尔斯符号学里的“符号”是个理论术语，指“再现体”（符号载体，常被直接称作符号）、“对象”（符号所代替的）和“阐释项”（符号引发的反应）构成的三元符号表意关系，三元关系所产生的阐释项可作为新的再现体，进入新的符号三元关系，产生新的阐释项，如此绵延以至无穷（CP 2.303）。而意义就产生于这样永无止境的符号过程，在此过程中皮尔斯使用了“翻译”一词（CP 4.127）。换言之，

翻译是将阐释项当作新的再现体，然后与对象和新的阐释项联系起来的过程，目的和结果是产生新的阐释项；某一阐释项的产生仅为实用主义上的最终，翻译总是可以重新进入符号过程。鉴于此，马雷（2019b: 107-108）把皮尔斯符号学的翻译概念解读为“再现体、对象和阐释项”之间“改变或建立关系”的永无止境的过程，是所有“过程-现象”从之涌现的过程。这不是说所有的符号过程都是翻译，而是强调只要卷入符号过程网络的过程-现象（包括过程和形式）本质上都带有翻译性。值得注意的是，马雷是从复杂性视角解读皮尔斯，没有断言他是纯粹的现实主义者或纯粹理想主义者。他认为皮尔斯符号学里的“翻译”概念表明意义不像唯心论那样仅是意识中的东西，而是意识（基于物质）与物质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的一部分（同上：88-92）。篇幅有限，相关内容不便展开。

从系统角度而言，皮尔斯符号学里的翻译概念将一个符号系统与另一个符号系统联系起来，产生阐释项。马雷将这种符号过程置于复杂性系统中，以体现符号过程的复杂性本质。也就是说，符号系统（包括符号过程）具有上文提及的复杂性系统的主要特点，是一个非线性、开放、非平衡系统，与其它系统之间存在各种复杂的因果关系，同时有自己的下阶系统，下阶系统还有下阶系统，理论上可以无限延续下去（Marais, 2014: 102-103）。据此，马雷（2019c: 43）进一步把皮尔斯的翻译概念发展为翻译是“复杂性的、涌现性的符号过程”（complex, emergent semiosis）。

三、涌现性符号翻译的定义

（一）关于涌现性符号翻译本质的定义

皮尔斯的翻译概念涉及过程和变化，

但他“未能具体阐述翻译究竟涵盖什么”(Marais, 2019b: 128)。换言之,皮尔斯的翻译概念只能从复杂性视角回答意义是如何产生的,但未能具体阐释产生于涌现性符号过程中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依据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或过程本体论,意义可理解为“在一定约束下呈现形式的过程”(Whitehead, 1985: 208-215)。这表明,意义是既涉及变化也涉及形式的过程,变化或过程是给定的,翻译要解释的不是变化而是为什么某些事情会稳定下来并呈现一定的形式(Marais, 2019b: 123)。复杂性思维主张实在的涌现受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约束。热力学第二定律,简单讲就是“熵增定律”,“熵”(entropy)是混乱程度的表述单位。从概率论的角度来讲,熵增定律指的是,在没有外力作用的情况下,事物或系统的发展趋势为从有序走向无序且不可逆,当熵增加到最大值,则系统达到最混乱无序的状态,就会停滞或死亡。对抗熵增是熵减,即逆着熵增做功,制造负熵(negentropy)。因此,“生物的生命体是通过抗衡第二定律运行的”,通过做负熵的功来获取自组织能量并展现生命力(Deacon, 2011: 208-287)。皮尔斯的三元符号系统,同所有生命系统一样,是开放的、自组织的,同时受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约束,所以建立关系的符号过程不仅受熵增驱动,也受熵减驱动。据此,马雷将翻译定义为:翻译是(由施为者做的)负熵符号功(negentropic semiotic work),在这种功的运作下,一个符号系统里的任一或多个成分发生改变、或者成分之间的关系发生改变、或者符号(系统)与环境(时间和/或空间)的关系发生改变。(Marais, 2019b: 141)

从生物符号学角度讲,所有的生物体都

有能力参与符号过程,所以此定义中的施为者包括所有生物体。符号系统的熵增是自然地走向混沌的过程倾向,熵减则需要外力能动地做功,这个做功者就是翻译,目的是通过施加“约束”(constraints),产生新的阐释项。这就需要改变符号过程中的再现体、对象或阐释项,或改变再现体、对象和阐释项之间的关系,或改变三元符号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使永不停止的符号过程呈现某些稳定态势的“吸引子”(attractors),趋向特定的“轨迹”(trajectory)(Marais, 2019b: 123、163)。简言之,翻译就是通过对符号过程施加约束而做的负熵符号功,目的是使符号过程产生使之趋向特定轨迹而非其它轨迹的吸引子。可见,涌现性符号翻译理论的核心概念除了负熵符号功,还包括约束、吸引子和轨迹,共同表达了符号翻译的涌现性。

(二) 涌现性符号翻译定义的核心词

翻译是负熵符号功,简单讲,翻译是一个对符号过程做功的熵减过程,体现符号过程呈现形式的本体性质。马雷用初始符号系统(incipient sign systems)和后续符号系统(subsequent sign systems)来抽象化这一过程(Marais, 2019b: 53)。因为符号过程是永不停止的过程,初始符号和后续符号都只是相对于某一观察过程的“初始”和“后续”,它们本身也是系统,也处在过程当中,初始符号可能是其前一过程的后续符号,后续符号可能会成为另外一个翻译过程的初始符号。初始符号和后续符号“都是永无止境的符号过程中涌现的现象,是可识别的过程中的形式而非稳定的事物”(同上: 124)。

吸引子、轨迹和约束皆为源于自然科学(如数学、物理、力学)的术语,一些学者(如迪肯)于近些年将这些术语引入人文

研究。前文提过，复杂性系统的涌现性不但表现在实在涌现的层控性，还体现在涌现过程因果关系的确是双向和非线性的。迪肯（Deacon, 2011: 182-205）用“约束”概念来规避向下因果关系的直线性问题。他认为当事物的发展呈现某些习惯或趋势时，自然会去除另外一些习惯或趋势的可能性，而那些未实现的可能性（unrealized possibilities）成为整体上的一组“约束”，促使这些习惯或趋势的出现。如此，未实现的可能性与系统的物质基础或已实现的可能性一样具有向下的因果关系，约束着系统并使之趋向某个轨迹。就系统而言，这些未发生的可能性，即“约束”，体现的是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之间的非直线性关系，可避免整体和部分之间因果关系的“循环论证问题”以及“关于偶然性的逻辑问题”（Marais, 2019b: 136）。需要指出的是，翻译是通过施加“约束”对符号过程做功，此处的“约束”含有“限制”和“使能”的双重含义，但本质上是指“不可能性”，因为使能或赋予条件的同时排除了一些可能性。

事物发展总的习惯或趋势可视为事物发展的轨迹，轨迹的形成与趋向该轨迹运动方向的“吸引子”有关。吸引子可定义为“事物趋向于特定轨迹的一般趋势或稳态”（同上: 161）^③。简单理解就是，在永不停歇的符号过程中，某个过程中事物有朝某个稳态发展的趋势，这个稳态就叫做吸引子。轨迹指在这个稳态或不同稳态影响下系统所趋向的走势或路径。

吸引子的出现离不开符号过程的初始条件（initial conditions）和边界条件（boundary conditions）。“初始条件”是一个过程的初始状态；“边界条件”是限制系统的

因素。例如，“当考虑打台球时，初始条件将是球的数量及其在桌子上的位置，而边界条件将是桌子的大小，桌面是否为100%平整以及台布的性质；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构成了特定轨迹涌现的背景”（同上: 136）。吸引子对初始条件非常敏感，其导致的趋势（过程中的系统整体和结构）又会与整个系统和部分进行交互和回应，系统中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又会互相影响互相作用，致使“结果导致结果”（Marais, 2019a: 59）。因此，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可能导致轨迹后续发展不可预测的变化，对某个事物的符号过程观察应首先和同时观察该过程的背景，背景变了，吸引子以及吸引子导向的轨迹都可能改变，开始另外的符号过程。

以上关键词表明符号翻译过程是复杂的、涌现的，涉及不同的层级和非线性因果关系。“涌现性”是马雷复杂性视阈下符号翻译理论的根本特点，故这里将其简称为“涌现性符号翻译理论”。

（三）涌现性符号翻译定义下的语际翻译和社会实在

马雷认为涌现性符号翻译定义也可解释语际翻译，即：语际翻译也是过程-现象，本质上带有涌现性符号过程的性质，是对符号过程施加约束使之呈现形式的过程。首先，翻译研究常用的原文文本和目标文本都是永无止境的符号过程中涌现的初始符号系统和后续符号系统，都是“符号过程中的一种形式”（Marais, 2019b: 60; 2019c: 45）。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直线的二元关系，而是时间过程上涌现的不同部分，但在时间上又是单向的、不可逆的。尽管不同译文产生的翻译过程（指符号过程）在本质上相同，但影响从原文到译文之间符号过程的初始条件和

边界条件不同，这些条件不仅涉及符号或语言的性质，也涉及时间流。因此，没有任何译文可以是原文的精准副本或绝对新颖的创作。其次，译文文本可被视作翻译过程中一个体现层控特点的嵌套系统（*nested systems*），句子是低层级系统，词汇是更为低层级的系统，文本题材或类型可视为更高级的系统。这些层级之间和上下层级之间都有因果互动关系。译文的“涌现”不是各层级及其组成部分本身，而是“不同层级不同组成部分在特定约束下互动的结果”（*Marais, 2019c: 48*）。

此外，前文提及符号过程是连接物质和社会的一个点，社会实在通过符号下阶层级的运动过程而涌现。马雷进一步把涌现性符号翻译定义发展至可解释所有社会实在的涌现，即“社会和文化都是从对符号过程施加约束以抵抗熵增的负熵符号功中涌现出来的”（*Marais, 2019b: 163*）。

综上所述，涌现性符号翻译理论的基本观点为：翻译是通过符号过程施加约束而做的负熵功，是与熵增抗衡的熵减过程，来创建趋向于特定路径的吸引子；所有的社会文化实在（包括语际翻译现象）都可视为从翻译中涌现的过程-现象。

四、涌现性符号翻译理论的意义

篇幅所限，这里仅从认识论、方法论和学科互涉方面简析涌现性符号翻译理论的意义。

（一）对“意义”的处理可谓翻译理论研究的突破

马雷以复杂性哲学认识论为出发点的翻译理论建构，使翻译理论探索重又回到普遍性和特殊性、本体论和认识论、主观和客观

等人类乃至整个浩瀚宇宙的重大问题；就翻译而言，回到意义的问题。现代和后现代翻译研究的哲学意义观都与“结构”和“二元符号（能指与所指）”有关，关注意义是如何产生的。马雷的涌现性符号翻译理论既不像现代翻译研究那样在稳定的、可还原的结构关系中谈意义，也非像后现代那样否认一切结构和基础的相对主义过剩，而是在复杂性视阈下基于皮尔斯三元符号论将实在作为经验的一部分，主张一种兼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过程本体论意义观。

一方面，新世纪以来，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为翻译领域引入大量新的概念，但这些翻译概念主要是对新现象的反映，并未从哲学意义观上打破对翻译的定义，本质上还是现代翻译研究的结构主义意义观。另一方面，涌现性符号翻译理论认为意义的变化和不确定是给定的，但这种意义的不稳定观与大多后现代翻译研究所基于的德里达的解构意义观至少存在两点本质区别。第一，德里达从二元符号的视角认为翻译是“有约束的变形”（*regulated transformation*）（*Derrida, [1972]2002: 20*），“变形”是意义没有稳定来源的必然结果，无休止的所指的延异过程或能指与能指之间永不停歇的互动也是意义产生的条件或对意义的“约束”，但他终究没有指出意义在本体上到底是什么。第二，与否认有终极阐释的解构意义观不同，涌现性符号翻译理论承认实用主义的“终极阐释”，主张意义不稳定的同时，并未否认意义变化过程中涌现出的“结构”，只不过这些结构是在某一具体过程中因实用主义目的而稳定下来的形式，呈现出意义在时间过程上的本体性。

（二）相关概念工具可带来方法论启示

涌现性符号翻译理论涉及的约束、轨迹、

吸引子, 以及初始符号系统、后续符号系统、初始条件、边界条件等概念, 可作为过程导向研究模式的分析工具, 帮助研究者在出发点和分析方法上保留对所观察事物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原因与结果的复杂性看法。过程导向的翻译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 如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 (ANT) 启发下的翻译研究。但拉图尔 (Latour, 2007) 否认实在涌现过程中的“结构”, 其行动者网络理论启发研究者对社会现象的过程考察, 但缺少解释工具。涌现性符号翻译理论的理论假设和概念工具可帮助考察初始符号如何在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的约束下呈现某些吸引子, 在不同吸引子之间转换的轨迹, 从而发展为后续符号这一复杂的翻译过程。这可帮助研究者在考察初始符号变为后续符号具体实践过程的同时, 也可解释这一过程的多层次复杂因果关系。

涌现性符号翻译定义也适合对当前翻译领域内涌现的新现象和语际翻译进行实证研究。无论是译文产生的过程还是译文本身, 都可当作复杂性现象对之进行研究。需要注意的是, 这不是从传统或现代翻译概念出发去探讨翻译的复杂性 (这其实是大部分翻译研究在做的事情), 而是从符合复杂性认识论和假设的翻译定义出发, 应用相关的理论模式 (理论的基本假设、概念工具) 对之进行研究。

(三) 从翻译定义和学科层面实现“一”和“多”的悖论统一

涌现性符号翻译定义可能会引发有关翻译研究学科边界的争议, 但马雷 (2014: 78; 2019c: 46-47) 认为, 作为一个学科, 翻译研究至少应包括两部分研究: 其一, “对实在现象的研究”; 其二, “对这些研究进行整

合”。这说明, 一个学科终究需要“一”的概念, 以使“一”和“多”保持悖论并置, 从理论上既包括相似性也包括差异性。涌现性符号翻译理论, 首先在定义上涵盖翻译研究中的各种二元对立和不同“转向”, 关注不同方面在翻译涌现过程中的互动联系。其次, 以实在涌现过程的翻译性本质来定义翻译, 不但可以解释语际翻译, 而且可作为元理论来解释所有符号翻译实例, 解释所有呈现翻译性的现象。因此, 涌现性符号翻译理论, 可帮助从翻译研究学科视角对其它领域内的社会、文化实在的涌现进行研究, 与其它学科建立起广阔的互动平台, 实现学科的互涉价值。这不是说把所有的社会和文化现象都视为涌现性符号翻译, 而是从翻译性或翻译学科的视角来关注社会文化现象产生和发展的复杂性, 为相关研究提供一种或然的 (alternative) 思维方式和研究途径。

五、结语

翻译研究, 作为一门学科, 涉及不同研究范式。无论何种范式, 都需要有对此范式的理论建树, 从哲学认识论、意义、翻译定义, 至概念工具, 层层推进, 既解决“意义”这个复杂的东西, 也为相关实例研究提供可操作模式。翻译研究从传统、现代、后现代到复杂性的范式演变, 某种程度上既表明翻译研究乃至所有人文学科发展过程中涌动的哲学暗流的变化, 也从翻译研究视角代表着人类在认识世界方面的进步。如果某一学科的前沿研究未必是当前流行的或新潮的, 但一定是基础的且不断地回到学科的重大问题上, 马雷基于复杂性视角的涌现性符号翻译理论, 可谓当前国际翻译理论的前沿研究, 值得深入探索和完善。

注释 |

- ① 关于复杂性有不同的提法,常见的有“复杂性研究”(complexity studies)、“复杂性科学”(complexity science)、“复杂性理论”(complexity theory)和“复杂性思维”(complexity thinking)等。这些不同术语的提法产自不同学科的复杂性。其中复杂性理论和复杂性思维的提法相对较多,前者由于其涉及的定量、数理和计算等研究方法,常见于自然科学,后者更常见于哲学和人文倾向的学科(可见参考文献[20]第45页)。目前一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将二者混合使用。本论文为表述上的方便对这些术语交替使用,不做区分,但总体上倾向于用“复杂性理论”来综合指代所有提法。
- ② 本文对英文参考文献的直接引用(带引号的内容),若非作另外说明,皆为本文作者自译。
- ③ 此处的“吸引子”概念是借用动力学中的“奇异吸引子”(strange attractors),奇异吸引子趋向的轨迹是复杂的,呈现一定的稳态,但不会像钟摆(周期性吸引子)般精确地复制路径。

参考文献 |

- [1] 杜玉生、何三宁. 复杂性思维与翻译理论创新 [J]. 湖北大学学报, 2010(3): 119-122.
- [2] 吕俊. 开展翻译学的复杂性研究: 一个译学研究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革命 [J]. 上海翻译, 2013(1): 1-6.
- [3] 吕俊、侯向群. 走向复杂性科学范式的翻译学 [J]. 上海翻译, 2015(2): 5-11.
- [4] 宋美华. 西方翻译研究的传统、现代与后现代: 区别、对立、共存 [J]. 中国翻译, 2018(2): 17-24.
- [5] 宋美华. 本质主义, 还是非本质主义?——翻译研究传统、现代与后现代哲学意义观的思考 [J]. 上海翻译, 2019(5): 7-13.
- [6] Bassnett, Susan & Johnston, David. The Outward Turn in Translation Studies [J]. *The Translator*, 2019(3): 181-188.
- [7] Chesterman, Andrew. Consilience or Fragmentation in Translation Studies today? [J]. *Slovo. ru: baltijskij accent*, 2019, 10(1): 9-20.
- [8] Dam, Helle V., Brøgger, Matilde N. and Zethsen, Karen K. (eds.). *Moving Boundari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 [9] Deacon, Terrence W. *Incomplete Nature: How Mind Emerged from Matter* [M]. New York: WW Norman & Company, 2011.
- [10] Delabastita, Dirk. Translation Stud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Trends and Perspectives [J]. *Génesis. Revista científica do ISAI*, 2003(3): 7-24.
- [11] Derrida, Jacques. *Positions* (Revised ed.) [M]. Alan Bass (trans.).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1972]2002.
- [12] Gambier, Yves & Van Doorslaer, Luc. Disciplinary Dialogues with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Background Chapter [A]. In Yves Gambier & Luc van Doorslaer (eds.). *Border Crossings: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Other Disciplines*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6: 1-22.
- [13] Latour, Bruno.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 Theory*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14] Marais, Kobus. The Representation of Agents of Translation in (South) Africa: Encountering Gentzler and Madonella [J].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2011, 6(2): 189-206.
- [15] Marais, Kobus. Exploring a Conceptual Space for Studying Translation and Development [J]. *Southern African Language and Applied Language Studies*, 2013, 31(4): 403-414.
- [16] Marais, Kobus. *Translation Theory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A Complexity Theory Approach* [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4.
- [17] Marais, Kobus.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Development [J]. *The Translator*, 2018(4): 295-300.
- [18] Marais, Kobus. Effects Causing Effects: Considering Constraints in Semiotranslation [A]. In Kobus Marais & Reine Meylaerts (eds.). *Complexity Thinking in Translation Studies: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C]. New York: Routledge, 2019a: 53-72.
- [19] Marais, Kobus. *A (Bio)semio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The Emergence of Sociocultural Reality* [M]. London: Routledge, 2019b.
- [20] Marais, Kobus. Translation Complex Rather Than Translation Turns? Considering the Complexity of Translation [J]. *Syn-Thèses*, 2019c (9-10): 43-55.
- [21] Marais, Kobus. Translating Time: Modelling the (Re)Processing of Emerging Meaning [J]. *Punctu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miotics*, 2020(1): 109-131.
- [22] Marais, Kobus & Feinauer, Ilse (eds.). *Translation Studies Beyond the Postcolony* [C].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ress, 2017.
- [23] Marais, Kobus & Kull, Kalevi. Biosemio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Challenging “Translation” [A]. In Yves Gambier & Luc van Doorslaer (eds.). *Border Crossings: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Other Disciplines*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6: 169-188.
- [24] Marais, Kobus & Meylaerts, Reine. Introduction [A]. In Kobus Marais and Reine Meylaerts (eds.). *Complexity Thinking in Translation Studies: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C].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9: 1-18.
- [25] Marais, Kobus & Meylaerts, Reine (eds.). *Exploring the Implications of Complexity Thinking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C].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22.
- [26] Mitchell, Melanie. *Complexity: A Guided Tour*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27] Morin, Edgar. *On Complexity* [M]. Robin Postel (trans.). Cresskill: Hampton Press, [1990]2008.
- [28] Peirce, C.S.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Z]. s.l.: s.n., 1994.
- [29] Sawyer, R. Keith. *Social Emergence: Societies as Complex System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30] Van Doorslaer, Luc. Bound to Expand: The Paradigm of Change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 In Helle V. Dam, Matilde N. Brøgger and Karen K. Zethsen (eds.). *Moving Boundari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220-230.
- [31] Waldrop, M. Mitchell. *Complexity: The Emerging Science on the Edge of Order and Chaos* [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2.
- [32] Whitehead, Alfred N. *Process and Reality* (Corrected version) [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5.

Translation Behavior Studies: A Criticism-oriented Conceptualization

By ZHOU Lingshun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China) p.16

Abstract: With its distinctively human orientation, the studies of translator behavior has emerged as a major area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an important subject for both translation criticism and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as well. This article takes a close look at the theoretical background of translator behavior studies and its three research paradigms, defining its disciplinary attributes and identifying its relations to adjacent fields. It argues that since a critical approach to translator behavior studies was first proposed and adopted in China, and especially since such an approach has been systematized over the past decade by Chinese translation scholars, 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 ought to be counted as one of the areas in which the Chinese schoo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has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international dialogue on translation.

Keywords: translator behavior studies; 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 research paradigm; the Chinese school of translation theory

Towards a *Dao/Qi* Poetics of Translation

By ZHANG Hongyu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 LIU Huawen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 &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p.24

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conceptual pair of *dao* (道, the way or the guide) and *qi* (器, utensils) from the ancient Chinese classic *Zhouyi* (*The Book of Changes*) be applied to the theorization of translation, for from such an act a *dao/qi* poetics of translation would result, shedding new light on core question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such as how to be faithful, what is translatable and what not, or what is the appropriate styl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such a poetics, the translator should strive to be faithful not just to the *qi*, i.e., the literal expression, of the source text but also to its *dao*, i.e., its underlying essential meaning. In the light of *Zhouyi*, translation thus means to use language as a carrier for both the literal and the between-the-lines meaning of source text, which renders possible a new way of representing the source text in the translated version and justifies a multitude of stylistically variable target texts that convey nonetheless the same essential meaning of the original.

Keywords: *Zhouyi* (*Book of Changes*); *dao*; *qi*; poetics; the principle of change; translation

The Concept of Complexity and the Theory of Emergent Semiotic Translation

By SONG Meihua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China & University of Leeds, Leeds, UK) p.33

Abstract: Of the translation scholars in China and abroad who have recently taken a keen interest in the notion of complexity, Kobus Marais from South Africa is the most notable. Drawing on Peirce's semiotic conception of translation and taking the philosophy of complexity as his epistemological point of departure, Marais formulates an emergent semiotic translation theory in response to some fundamental issues brought to the fore by current trend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Transcending the conceptual divide between traditional, modern (empirical) and post-modern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Marais's new model provides a unified theory of translation capable of explaining the nature of translational phenomena, and thus adds significance to translation studies in both its epistemological, methodological and transdisciplinary aspects.

Keywords: complexity; emergence; semiotic translation; constraints; attractors

National Translation Capacity and Its Index: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By REN Wen & ZHAO Tianyua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p.44

Abstract: As a cultur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ctivity, translation provides a country with both a critical